

# 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骆郁廷 尹忻瑶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一个结合”突破了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一个结合”还突破了“两个凡是”僵化思想的束缚,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党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突破了“洋教条”的思想束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共同推动强国复兴的历史伟业。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思想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6)09-0002-11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sup>[1]</sup><sup>46</sup>。这个重要判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过程中的高度自觉及文化自信,推动了新时代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以深刻的思想解放为先声。围绕“第二个结合”何以构成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一命题,国内学界立足多重分析视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划分为三类阐释路径。第一类研究侧重历史脉络梳理,立足百年党史考察“第二个结合”生成演进的完整历史进程。韩振峰和李思涵指出“第二个结合”并非一蹴而就的理论论断,而是历经百年积淀形成的动态理论成果,蕴含厚重的历史纵深与文明底蕴<sup>[2]</sup>。陈方刘则以三份党的历史决议为关键坐标,系统梳理“结合”理念从自发探索走向理论自觉、从“一个结合”拓展至“两个结合”的嬗变轨迹,为明晰“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搭建起清晰历史叙事框架<sup>[3]</sup>。第二类研究聚焦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靶向,明确其所要破除的各类认知桎梏。曾维伦和伍燕玲提出,步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关键交汇期,西方中心论、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持续催生精神枷锁,割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消解我国文化主体性与话语自主权,由此催生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现实需求<sup>[4]</sup>。陈志刚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对照指出,“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多层维度的思想突围:一是纠治长期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定位;二是同步驳斥文化复古、文化排外两类极端思潮,打破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明互斥的固化认知;三是从文明叙事、理论建构双重维度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sup>[5]</sup>。罗骞通过将“第二个结合”这又一次思想解放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区分开来,阐明二者分属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革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四个层面阐释“第二个结合”独

**作者简介:**骆郁廷,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杰出学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尹忻瑶,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特定的方法论解放价值<sup>[6]</sup>。第三类研究立足哲学方法论与文明论视域,剖析“第二个结合”实现思想解放的内在机理,阐释其拓展的理论创新场域。杨增崇和叶臻立足大历史观展开分析,认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必然性源于传统文化无法自发导向现代化的历史局限与近代文明被遮蔽的现实困境,其可能性则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深刻扬弃,由此孕育兼具科学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底色的新型文化生命体,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sup>[7]</sup>。张钦亚从哲学高度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深层理据,认为其实现了时空观、实践观、文化观三重范式革新,将“第二个结合”升华为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创理论范式<sup>[8]</sup>。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第二个结合”本身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较少将其与“第一个结合”所实现的历次思想解放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演进。”<sup>[3]</sup>要想论清“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必须厘清“第一个结合”与党的历次思想解放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此,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分析方法,在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出场语境和思想要义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两个结合”共同促成的三次思想解放进程,完整揭示新时代“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内在理论必然性。

### 一、“第二个结合”的出场语境和思想要义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需要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出场语境,分析“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义,为新时代深入理解、把握和落实“第二个结合”奠定基础。

#### (一)“第二个结合”的出场语境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和阐述如何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得出的重要论断。早在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sup>①</sup>,“第二个结合”的意蕴已见萌芽。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应积极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资源<sup>[9]338-339</sup>。这里提到融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sup>[9]339</sup>。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阐明,“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sup>[10]</sup>,方能将美好愿景付诸现实。这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引起了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sup>[11]418</sup>,使之再度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传统有机贯通起来,已然明确前者“激活”后者的“第二个结合”之契合点<sup>[12]</sup>。同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明确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sup>[13]715</sup>,“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呼之欲出。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3]683</sup>,标志着“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正式诞生。同年11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将“第二个结合”载入其中<sup>[15]</sup>。“两个结合”被确立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2022年10月,“第二个结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回应时代与实践的重大课题的根本遵循。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

①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4-09-24).[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24/content\\_2755666.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09/24/content_2755666.htm).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基础上生长演进的,其根本路径即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sup>[14]288</sup>,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关系到人民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增强,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转型创新,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因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 (二)“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以历史主动精神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首先,“第二个结合”坚持与发展了“第一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sup>[16]</sup>,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所指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具体的“文化实际”“历史实际”,并且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发展和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实际。但这种文化的、历史的实际又是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不同的一种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相互融通的过程,而中国人的这些思想、文化和精神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可见,“第二个结合”深化了“第一个结合”的思想内涵、文化认同与心理基础。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

契合”<sup>[1]43</sup>。正是有了彼此契合,才能做到相互结合“第二个结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旨在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使“第一个结合”拓展到历史与文化的层面,更为全面和深刻。

其次,“第二个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sup>[1]44</sup>。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sup>[1]44</sup>。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学说,更“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sup>[1]44</sup>。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中华文明原有的民本思想、九州共贯的大一统观念、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富民厚生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促进了人民民主、中华民族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等现代文明形态的生产发展。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核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sup>[9]45</sup>。“魂脉”与“根脉”深度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标志,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最后,“第二个结合”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现实进程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sup>[9]313</sup>只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才能避免因盲目追随外来文化而丧失文化主体性、避免因忽视民族特色而让理论成果失去文化辨识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sup>[1]46</sup>。这表明,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自觉地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有益成分,从而推动中国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创造性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旨在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更具创新力、阐释力、感染力和引领力的科学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成为真正面向未来、引领时代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 二、“第一个结合”与党的历次思想解放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打破了一次又一次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党的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为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 (一)“第一个结合”与党的第一次思想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倍加推崇,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却缺乏思考和准备,一度存在简单照搬十月革命经验的倾向。在大革命及土地革命初期,受共产国际影响,党内奉行“城市中心论”。中共中央也一度认为可以效仿十月革命模式,纷纷在中心城市发动革命,先后发起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但因脱离中国实际而相继失败。在敌强我弱、起义屡挫的残酷事实下,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sup>[17]</sup>。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城市辐射农村”的道路是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三座大山”的统治呈现出“城市强、农村弱”的显著特征。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

胜利的新局面。然而,这一正确探索却遭到党内一些教条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认为其违背了中心城市爆发革命的十月革命经验,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错误决策,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既要认真研读,更要“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sup>[18]</sup>。然而,该正确主张遭到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的压制,“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影响越来越大。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顽固坚持唯有中心城市首先爆发武装起义才能引领全国革命。基于这一错误判断,他们将毛泽东同志以主要力量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主张,错误地定性为所谓“极端错误的”<sup>[19]12-13</sup>。他们制定了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造成了严重危害。“立三路线”被纠正后不久,掌控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和博古仍然深陷“左”倾错误窠臼,教条主义愈演愈烈,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而非行动指南,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纸上谈兵”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湘江战役惨败,党和中国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先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然而,由于当时极端紧迫的战争环境,遵义会议未能从思想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系统清算。随着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长征途中遗留的思想与政治问题和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构成了隐患。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第一个结合”的正式表述,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20]534</sup>,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转化,促使其在各个层面的论述中都烙印上本土固有的鲜明特质,“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20]534</sup>,还强调“教条主义必须休息”<sup>[20]534</sup>。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把建党18年来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本质上都是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sup>[20]611</sup>这一原则的深刻领悟与自觉运用。从第一个阶段的“还不善于”<sup>[20]611</sup>结合,到第二个阶段“更多地学会了”<sup>[20]611</sup>结合,再到第三个阶段达到“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sup>[20]612</sup>。这一脉络清晰表明,党正是在不断深化“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克服教条主义,从而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第一个结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必须将这二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sup>[20]707</sup>,关键在于通过适当的民族形式予以表达,而非不顾实际地套用公式,如此方能发挥其理论实效,建设好新社会和新国家。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第一个结合”的重要地位,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条件的不断结合,这一过程贯穿了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年的全部历史<sup>[21]795</sup>;而这一结合一旦实现,便“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sup>[21]796</sup>。之后,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一个结合”成为全党共识,在全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彻底冲破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的思想禁锢。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sup>[22]</sup>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开篇便指明了“第一个结合”的重要作用:“中国共

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sup>[19]1</sup>第一个历史决议系统梳理了自建党以来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所致的历史教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成功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卓越历史功勋,着重指明了“第一个结合”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此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总结,“第一个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sup>[21]1093</sup>。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经由毛泽东同志的集中概括与理论创制,“第一个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sup>[23]</sup>。“第一个结合”被写进党的七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标志着“第一个结合”的正式形成和确立,为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并坚决贯彻“第一个结合”这一“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sup>[21]1094</sup>,突破了战争年代将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不再照搬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革命模式,也不再盲从关于农村与农民阶级的传统判断,而是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及道路,开辟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依托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最终达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目标。

## (二)“第一个结合”与党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出炉<sup>[24]</sup>。“两个凡是”将具体决策和个别指示绝对化、教条化,排斥对实际情况的辩证分析,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背离。这种僵化的教

条主义思维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进步。

当时,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sup>[25]</sup>,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鲜明地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sup>[26]</sup>。这篇文章强力冲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sup>[27]</sup>。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出强有力的号召,积极肯定并大力褒扬党内多数同志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sup>[28]114</sup>的优良作风,同时,严肃批评了部分同志照抄照转照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精神的错误做法,要求全军高级干部“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sup>[28]124</sup>。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进一步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他指出,若继续固守“两个凡是”的提法,必然会对毛泽东思想造成损害<sup>[28]126</sup>。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其精要即在于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有机统一起来<sup>[28]126</sup>。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在这场讨论中被逐步挣脱,“第一个结合”重新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方法和实践遵循。

为进一步解答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不仅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出高度评价,指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sup>[28]143</sup>,还提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实践“第一个结合”。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sup>[29]</sup>,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

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sup>[28]279</sup>。在这一时期,“第一个结合”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错误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思想中解放出来,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当作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一切从书本、文件出发的本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从以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经验套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新时期全党全国人民的再一次思想解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常被简称为“第二个历史决议”)于1981年6月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审议通过。该决议总结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深刻阐明了“第一个结合”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sup>[19]380</sup>。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明确将体现“第一个结合”的实事求是,确立为我党“必须永远坚持”<sup>[19]145</sup>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第一个结合”的持续推动下,重新确立并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旗帜,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禁锢,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敏锐把握时代主题的同时,立足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带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富起来”。

### 三、“第二个结合”与党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看世界,看到了当时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与 modern 管理方法,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sup>[29]</sup>。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盲目崇拜西方、鼓吹“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也在滋长。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成为力图主导改革的重要思潮,加之西方“颜色革命”和错误价值渗透,出现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视西方一切为主臬的新的教条主义,即“洋教条”。“洋教条”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断发酵,严重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照搬照抄西方的一切,以西方的理论、文化、价值和制度作为剪裁和评判中国现实的尺度,导致严重的水土不服,成为阻碍中国创新发展的严重精神束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第二个结合”,强化了人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切实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和文化的自信,破除了“洋教条”的精神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又一次思想解放,赋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第二个结合”驱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迷障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通过主观地解构历史、片面地解读历史,试图削弱和推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史的认同,说到底是否定“四史”<sup>[30]</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发挥的引领作用予以消解;第二,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规律性提出质

疑;第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核心地位加以否定<sup>[31]</sup>。而“第二个结合”正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通过把握“魂脉”和“根脉”的本质关系,深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从根本上否定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

“第二个结合”确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随着“第一个结合”走向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进步,其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也不断加强,而这恰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焦点。历史虚无主义以割裂中华文明演进连贯性、削弱其主体文化地位为切入点,试图在深层次文化基础上阻止“第二个结合”的进程,其深层目的是颠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并侵蚀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根基<sup>[32]</sup>。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形成中国特色的基本前提,而正是这种特色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今日的成功实践<sup>[14]288</sup>。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割断历史、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赋予了文化自信以时间和历史的厚度,破除了文化自卑心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共产党百年间走过的辉煌征程、缔造的卓越功绩、铸就的伟大精神、积累的宝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sup>[14]14</sup>的过程。“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充分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历史必然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同样不可或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sup>[33]</sup>,还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累积的智慧精华,更是在全球多元文化浪潮中确保我国文化自主地位的关键依托<sup>[14]282</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真理和价值力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源头活水。弘扬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心,是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及制度自信的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而“第二个结合”则以“必由之路”的定位,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角色,实现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超越。

“第二个结合”驱散了历史终结论的迷障。历史虚无主义在政治上必然为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新自由主义张目,试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为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长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获的“最大法宝”,即在于以中华五千年文明为底蕴,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sup>[14]288</sup>。“第二个结合”这一历史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贯通古今中自觉重塑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更为广远的历史纵深感,有效地充实并夯实了其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层文化基础<sup>[14]290</sup>,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sup>[14]290</sup>的辩证互动中,深刻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sup>[14]289</sup>,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明根基上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不可偏废,守住这两个根本要素,是推动理论创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sup>[14]95</sup>。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魂脉”与“根脉”辩证统一的论述,有力批判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历史虚无主义试图通过否定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来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而“第二个结合”则以“必由之路”的实践必然性,确证和夯实了基于文明根基的道路自信,构成了对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图谋的最有力回击。

(二)“第二个结合”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认知窠臼

西方文明长期通过侵略掠夺、殖民扩张、文化输出等手段,将自身文化包装成“普世价值”,鼓吹西方模式是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试图引导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误区<sup>[34]</sup>。“第二个结合”正是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出发,通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批判“西天取经”谬论,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论”的盲目崇拜现象。

“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西方中心论”的本质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其运作逻辑在于通过消解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确立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地位<sup>[35]</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种文化想要长远传承并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4]291</sup>。文化主体性之于民族文明延续所具备的根本性价值,在此得到了充分阐发。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通过“两个结合”建立起来的<sup>[14]291</sup>。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正是以“第二个结合”为路径,“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sup>[14]296</sup>,通过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独特内核得以传承与彰显,并最终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过往历史的最佳延续,在于开创后续历史的新篇;对人类文明成就的最高敬意,则在于贡献一种新型文明形态<sup>[1]50</sup>。作为这种新形态的具体承载,中国式现代化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本质,融汇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优秀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向,并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崭新面貌<sup>[14]80</sup>,不仅回应了当代人类发展难题,直面西方现代化伴生的贫富悬殊、社会失序、霸权主义、生态危机、战争动乱等困境,更是对西方强权、霸道、偏执、自私“文明”的纠偏与超越,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更富包容性、更具持续性的文明方案。“第二个结合”让我们在历史的回响、价值的坚守、文明的创新中确认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证明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不需要寻求“西方模式”“普世价值”的认可。

“第二个结合”批判了“西天取经”的错误性。“西方中心论”在认识论上往往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将西方学术话语视为唯一标准,陷入“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的误区。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乃是我们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偏离的理论基石,倘若“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sup>[36]</sup>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天取经”的迷思曾长期困扰诸多发展中国家。受“西方中心论”的裹挟和影响,这些国家不顾自身国情与历史条件,机械地移植西方制度模式,其结果普遍呈现适应性不良,绝大多数陷入了经济增长迟缓、社会秩序紊乱与政局持续动荡的困境<sup>[14]81</sup>。面对相似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汲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指出,简单地沿袭他国路径无助于突破,机械地仿效易于丧失方向,唯有经由切实的实践探索方能获得真理性认知。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只能由该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加以决定<sup>[37]</sup>。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深刻社会变革,既不承旧制,也不抄书本,更不仿别国,“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sup>[9]344</sup>。中国共产党人既不唯西方是从,亦不囿于“本本”教条,始终坚持被实践反复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自此,全党形成了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要想在发展中延续,对时代重大命题的解答要想经得起检验,关键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sup>[14]13-14</sup>。中国共产党人以“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陷阱。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

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14]291</sup>新时代,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依托“第二个结合”这一理论利器,中国共产党人在驳斥历史虚无主义与凸显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实践过程中,挣脱了“洋教条”的诸多藩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共同推动强国复兴的历史伟业,这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sup>[14]290</sup>“第一个结合”侧重于从现实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第二个结合”则侧重于从历史文化根基出发,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自信。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大厦。回望历史,“两个结合”先后突破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束缚,推动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sup>[14]288</sup>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特别要深刻把握和大力推进“第二个结合”,通过强化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要之处得以相互融通,不断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推动强国复兴伟大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3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韩振峰,李思涵.“第二个结合”:形成历程、核心要义及推进机制[J].江淮论坛,2026(4):5-14,193.

- [3] 陈方刘.从“结合”、“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途径的历史嬗变[J].思想理论教育,2026(8):36-43.
- [4] 曾维伦,伍燕玲.“‘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三重意蕴[J].重庆社会科学,2026(1):77-86.
- [5] 陈志刚.“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J].党的文献,2026(2):3-13.
- [6] 罗骞.“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J].哲学分析,2026(3):164-170.
- [7] 杨增崇,叶臻.论以“第二个结合”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科学蕴涵[J].思想理论教育,2026(8):44-52.
- [8] 张钦亚.时空观拓展、实践观深化、文化观创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理据[J].思想理论教育,2025(9):51-57.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6.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 燕连福,杨进福.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标、原则与进路[J].探索,2025(2):1-16.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3-24.
- [16] 张允熠,张弛.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叙事[J].思想理论教育,2021(9):10-1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开展大事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
-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 [19]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57.
- [23]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23.
- [24] 黄一兵.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4(3):20-30.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55.
- [26] 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1978-05-11(1).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02.
- [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9]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550.
- [30]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120-128.
- [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13(9):5-9.
- [32] 曹文泽,侯劭勋.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动向及现实危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7):48-55,108.
- [3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

- 京:人民出版社,2015:25.
- [34]唐爱军,刘智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世界观[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5-14.
- [35]李建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西方中心论”[J].思想教育研究,2017(4):80-82.
- [3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43-44.
- [37]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73.

## 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s Another Great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Luo Yuting Yin Xinyao

**Abstrac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represent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breakthrough in efforts to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constituting another great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The First Integration broke the ideological fetters of dogmatism during the wartime era, promot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Marxism, and blazed the trail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also broke free from the rigid mindset embodied in the “Two Whatevers”, advanc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econd Integration, which breaks the ideological bondage of “foreign dogmatism”, opens up new horizon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marks to another great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Together,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nd the First Integration advance the historic cause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Two Integrations;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责任编辑:杨果)